

中國傳統

史學的批評主義

——劉知幾與章學誠

林時民／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

——劉知幾與章學誠

林時民著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劉知幾與章學誠

林時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

2002[民 91]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5-1138-2 (精裝)

ISBN 957-15-1139-0 (平裝)

1. (唐)劉知幾 — 學術思想 — 史學
2. (清)章學誠 — 學術思想 — 史學
3. 史學 — 中國

601.92

91015688

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

——劉知幾與章學誠 (全一冊)

著 作 者：林 時 民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盧 保 宏 司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23634156

傳 真：(02)23636334

E-mail: 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studentbook.web66.com.tw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宏 輝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 話：(02)22268853

精裝新臺幣三二〇元

定價：平裝新臺幣二五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三 年 十 一 月 出 版

序 言

拙著前書《史學三書新詮－以史學理論為中心的比較研究》，誠如副標題所揭示的，是重視「史學三書」的史學思想、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而核心在史學理論，基本上是史學史的取向。而拙著本書《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選取中國傳統史學之中批評性和系統性最強的《史通》和《文史通義》兩書併論，基本上則是批評史學的研究取向，方法仍以比較法為主。書中以史評、事評、人評三大方面，立為三章，一審視劉、章兩氏透過史學批評的總結、批判和創新，建立其批評史學，而貫串全書架構者，其內蘊實際是存在於兩氏史家心目中的批評意識。

此書構思已久，然因生性疏懶及授課繁多，尤其每年皆有新課，準備費時，竊意又常存不能誤眾生之念，竟然一拖數年仍未著墨。此番多蒙系內黃秀政教授、王英男教授、吳昌廉教授、宋德喜教授、陳靜瑜教授及師大吳文星教授等諸賢，多方惕勉，不時督促，終使自己謝絕人情、排除俗務。鎮日居於斗室之中，揮汗疾書，艾歷多時，始致此書有面世之日。草擬原稿之間，多承中興歷史所系盧文婷、卓季志、周淑娟、邱雅萍諸位同學，犧牲課餘時間，全力配合，或幫忙電腦打字，或整

理文獻，致使撰述工作尚稱順利流暢，在期限之前完成全稿。

以上系內先進之提攜與同學之插肋，謹在此敬申謝忱，而台灣學生書局鮑經理邦瑞兄慨允付印，亦當一併申謝。書中應仍有不盡妥善之處，敬祈博雅，不吝指正。最後，謹以此書獻給內人楊月娥女士，感謝她十數年來人生旅途的多方扶助，以及操持家務、教學冗忙之餘，亦為此書之校訂盡力良多。

作者謹序

二〇〇二年仲夏

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

——劉知幾與章學誠

目 次

序 言	I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由與撰述取向	1
第二節 本書架構與章節微旨	6
第二章 史 評	9
第一節 治史宗旨：史法與史意	9
第二節 史學體例：斷代與通史	32
第三節 史學宗門：後來筆／當時簡與撰述／記注	45
第四節 擴大史域：雜述十目與六經皆史	57
第五節 史學任務：經世致用	73
小 結	87

第三章 事 評-----	91
第一節 官局修史制：「五不可」與「立志科」 -----	91
第二節 史官條件說：三長抑四長 -----	101
第三節 文士修史評：銓綜陶鑄兼談史文 -----	121
小 結 -----	139
第四章 人 評-----	143
第一節 史家人格類型論 -----	144
第二節 史家品格論 -----	159
第三節 史家技藝論 -----	179
小 結 -----	196
第五章 結 論-----	199
參引書目 -----	203
附錄一：劉知幾、章學誠學行編年簡表 -----	221
附錄二：史家類型試論：以劉知幾為例 -----	23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由與撰述取向

重拾劉知幾（661-721）、章學誠（1738-1801）這兩位中國近代以前著名史學理論大家的典著《史通》與《文史通義》來做研究，主要原因在基於下述兩大重要思考線索：

一、針對兩氏史學理論，近年由於教、學之便，愈是深入鑽研，愈覺得兩書餘蘊未盡，猶待掘藏。即使一來筆者已有《劉知幾史通之研究》《史學三書新詮——以史學理論為中心的比較研究》兩書的刊刻，意下猶有未足；二來台灣史學界近年來已較能正視傳統史學理論，立篇發論，其中不乏定見高論，成果丰硕，但仍可期待。^①

① 拙著兩書，前者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1987，200頁，對《史通》多作思想性的闡釋；後書由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印行，1997，462頁，則透過比較法，尋繹《史通》、《通志》、《文史通義》三書之間的聯繫、對立、承繼、發展等各項關係，找出其異同優劣及相關的理論體系、脈絡。近年來，有關傳統史家對古代中國史學理論的論著之研究，尤其劉知幾章學誠之史學理論的相關研究已有多篇，詳請參書後附錄參考及徵引書目。

二、置中國史學於世界史學潮流之中，每見西方正統史家對中國史學的漠視輕視，令人難過沮喪，乃至義憤填膺，茲舉兩例證之，如浦朗穆（J.H.Plumb 1911—）曾云：「中國人追求博學，然永遠沒有發展批評史學（the critical historiography）。批評史學是過去兩百年西方史學的重要成就。中國人永遠沒有意思視歷史為客觀的瞭解（objective understanding）」，^②又說：「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學者運用歷史資料，其實際目的，無殊於唐朝或漢朝。在其傳統綜合的基本原則範圍內，他們偶而能瞥及超乎朝代更替的制度的發展，但是中國歷史永遠沒有發展自我批評與發現（self-criticism and discovery）的方法，無情的考驗通則（the relentless testing of generalization）有目的蒐求文獻以證明假設，而此為西方歷史的特徵」。^③另一有名的史家白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1-1979）也曾說：「中國考據學（textual criticism）的發展，未能到達一較高境界，不配我們稱之為批評。換言之，即為未能對證據作科學的評價與分析」「中國歷史太有特徵被稱之為資治歷史（civil service history）了」「中國人能做龐大的分類工作，能編纂驚人的百科全書，並且能出產他們數不盡的瑣碎鉅訂的地方史，但是他們不能到達我們所謂的『綜合』（synthesis）的境界，

② J.H.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1969, pp.12~13。

③ 同註②，頁87~88。

他們沒有發展歷史解釋的藝術」。④西方學者的批評，固有其見地，亦極富啟發作用。中國史家固應拜受其言，而思所以創新。然而西方史家或種因於民族自我中心或固有成見，或種因於知識限制，僅憑少數翻譯作品據以論斷，實難免予人以一種近乎鑿空立論之感，不為無憾。

學貫中西，擅於中西史學比較的杜師維運教授對於近世紀以來的上述現象，即慨歎地亦公允地指出這些西方的正統史家，他們對中國史學的瞭解往往是極為間接的，僅憑一般印象及牢不可破的成見即對中國史學作出論斷，所以每每荒謬離奇，盡失學術水平。杜師說：

當他們頌揚近代西方文化最富歷史觀念，而批評中國文化極度缺乏重視歷史的觀念與態度時，殊不知重視歷史的文化，中國已發展達數千年之久了；當他們認為文藝復興以後西方史學已突破通往真歷史的最後障礙—希望窺探往事的真相，已發展出批評史學時，殊不知中國的希望窺探往事真相的史學意識，早在上古時代，即已形成，而其批評史學的出現，也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了；中國的修史，非盡如他們所謂純為官方事業；中國史學

④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 in *Listener*, 21 September, 1961. 譯文則採杜師維運, 《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作者自印。台北:三民書局總經銷, 1993), 頁13~18。

的珍貴，也絕非僅在史料的浩繁。^⑤

識鑑及此，杜師以爲舉證與西方史學家細細討論，乃是學術上的真理之爭，刻不容緩，故而發憤撰寫一部翔實寬闊的中國史學史，以見中國史學在世界史學叢林中所佔的地位。杜師宏願，偉哉雄哉，洎乎今已見二冊中國史學史問世，厚達七百餘頁，確是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之盛事。其書必造福萬千學子，鐫刻人心。^⑥

受到杜師的啓發與感染，竊心亦嚮往之，本擬有所蠢動，然自思斗筭譾陋，不敢唐突。^⑦遂退而自忖，若能在第一條線索的舊有基礎上，再有所別裁，以闡發劉章史學餘蘊，補述拙撰兩書未遂意之處，實亦勉強可行。故而遂擬以第二條線索中之西方史家每每批評中國史學缺乏批評意識，作爲本書的問題核心所在，探討中國史學是否確實缺乏批評意識？爲了突出此

⑤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一冊，頁22~23。

⑥ 杜師發願撰述多卷本《中國史學史》，可謂時機已至，應勢而出。前此各家多撰單冊成書之史學史，已略嫌單薄與粗糙，質量皆有待提升。杜師此書採多卷本，擬分三階段敘述，寫成三冊。（見第一冊〈自序〉，頁6）如今已按原計劃，撰就兩冊，分別於1993，1998刊行，吾人更盼另冊，甚或另兩冊、三冊能及早問世，以饗後學。

⑦ 撰述中國史學史，須才學博深如杜師者始能爲之，一般現代後學，古學既不深遽，西學又力有不逮，罕能卓然成爲大家，乃勢之必然耳。吾固不敢爲之，然竊意亦以爲史學史目今固不能爲，亦願降格爲大學生編撰一本《中國史學史常識》、《中國史學史解題》或《中國史學史Q&A》一類的基礎性讀物，作爲進階之用。

一中心論題，筆者選擇唐代劉知幾的《史通》和與《史通》並稱古代史學理論「雙璧」的清代章學誠之《文史通義》，一起來審視中國史學是否並未具備批評精神？

其實，中國古代的史論，大多散見於各類書籍之中的片言隻字，或分佈於前序後贊之中。西漢賈誼的三篇〈過秦論〉是歷史批評專文出現的開始。以後歷代史家承襲此習，偶或論批，但一直都是散篇。直至唐代劉知幾《史通》問世，史學批評理論才從文人的散論與史籍之附論中獨立出來，形成專著。^③《史通》分內外篇，內篇評論史書體例、史料採集和表述要點；外篇評論史官設置、史籍源流和史家得失。而《文史通義》則是繼《史通》之後，又一部史學批評專著，書中對清代以前的史書體例有更廣泛的評述，更精深的探討。也就是說，劉章兩氏的《史通》《文史通義》是中國史學史論中最具完整體系的批評專著，也是最具資格來讓西方正統史家認識中國史學精髓之一的批判代表著作。當然，我們必須組織若干論據加以論證，不能憑空只說如是。這就是下述所談的本書架構與章節微旨，透過相關的分析來建立客觀的成就，以取信於世人。

③ 史評之作，《左傳》、《史記》已啓其端。賈誼有〈過秦論〉、陸機有〈辨亡論〉，啓論史之風。後韓愈、柳宗元、蘇洵、蘇東坡等，亦皆有評史之文。其後王夫之《讀通鑑論》及《宋論》皆有極高價值；趙翼《廿二史劄記》亦是史評翹楚。然史評之巨著固始於《史通》。

第二節 本書架構與章節微旨

本書既以「批評」為核心而論中國史學，首當瞭解批評的意義，依《辭海》的解釋是「對於事物加以剖解並評定其是非優劣」，而批評主義（criticism）則是「凡取批評態度從本源上研究哲學，不取前人成說或假定一種原理，以為立論根據者」，又稱批判論，是一哲學名詞，德人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 A.D.）創之。本書使用「批評主義」一辭，其實並沒有特別的涵義，理由簡單只有兩個：一、從前述的定義來看，副標題的兩位史家劉知幾與章學誠，在《史通》、《文史通義》所展現的「批評」特質，從本源上研究史學，也決不蹈襲前人成說，在在均甚符合《辭海》定義。二、筆者拜讀浦立本（E.G. Pulleyblank）所撰〈中國歷史批評主義：劉知幾與司馬光〉，其中即以劉氏的批評主義或批判論逕稱其史學^⑨，浦氏對劉氏史學的了解和闡釋，在西方世界有其先驅者的地位。若其認可，則吾人何必枝節旁生，橫造異端？因而，筆者沿用其辭以稱述長遠以來的批評史學傳統。

批評的客體，即是中國傳統史學，意義上相對於現代史學，

⑨ E.G.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in W.G. Beasley and E.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61) pp. 140~150。

故本書所論之斷限，侷限於中國近代以前（Pre-modern）的史學，亦即大陸學界習稱的「古代」史學，而且僅限於史學（historiography），不及其他層面。儘管如此，所涵蓋的年代已經頗長，直從上古落於清代，約有三千年之久。要全面論述，事殊匪易，筆者才亦不足以敷，故僅能選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史家其中一二，做為個案來探討，以規知整個批評史學的重要流變。故本書即選擇專看劉知幾與章學誠兩大史家主體，如何批評古代中國史學？在批判之餘，又如何提出新論，建立新說，來提昇整個史學發展的水平，推動史學發展的進化。本書擬透過下列的章節架構的安排，來達此目標：除前後之〈緒論〉、〈結論〉兩章以外，重點完全放在〈史評〉、〈事評〉、〈人評〉三章，排除一些基礎的生平事略、思想概述、時代背景等等史料性質的敘述，直接入手析論。

〈史評〉章專就史學理論層面範圍之內的史料、編纂、校讎、目錄諸學，看劉、章兩氏在這些方面的卓見，其中涉及到史學的宗旨、體裁、體例、義例、門類、功用等方面不同的主張，即本章五個節次所要探討闡述的內容。從這裏可以審知兩位古代史家批評史學絕異但互通之處，得而掌握兩氏史學的精旨及史學理論結構的變化。

〈事評〉章則以兩位史家所曾經共同面臨過的課題來論述，與一般所謂「事評」是指歷史事件的評述，看法是不同的，有必要在此特別聲明，以免混淆了。他們對官局修史、史官條件、文士修史這三件事情都有共同的經驗，也都提出嚴厲批評

和解決之道，竟也形成其史學理論體系一個重要部分，故值得探討。

〈人評〉章是本書主體——劉、章兩氏針對傳統史家的批評作分類：(一)從人格類型的不同看史家撰史的風格之相異；(二)從史書內容和行事作風去分析史家品格的善惡高低，並做斷奪；(三)從史家修史工夫的特色去評斷技藝之好壞所在。當然本章所呈現的重點在人物本身，而不在史學理論與史學課題，本書已做區分。

凡上三章所涉及的範疇，都在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的原則下來撰述的，若僅牽涉個人絕學，則不包括在內。

第二章 史 評

本章針對歷史之宗旨、體裁、體例、功用等類分別論述，以悉劉知幾、章學誠兩氏相關之宏論。由於兩氏對古史的發難攻訐，以致古史常有體無完膚、盜甲全丟者，然究其實則因兩氏之批評，方有新論新見之建立，而充實豐富了傳統史學。

第一節 治史宗旨：史法與史意

治《史通》的學者，多謂《史通》是一部：(一)、史評（historical criticism）之書，如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列《史通》為史評類的第一部書；(二)、謂係史論（historical discussion）性質，如章實齋在《校讎通義·史考摘錄》云：「至於諸家蔚興，短長互見，遂有專門討論，勒成一書，若劉氏《史通》是也」；浦立本（E.G. Pulleyblank）亦云在他所見到的任何語文當中，《史通》是第一本有關歷史寫作的論述。^❶(三)、亦有學者以為《史通》是一部講「史法」的書，如章學誠所謂「鄭樵

❶ W.G. Beasley and E.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and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61) p.136

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②；呂思勉《史通評》亦云：「中國論作史之法，有特見者，當推劉知幾、鄭漁仲、章實齋三人」。^③同一部《史通》竟有三種不同的說法，猶如鄭樵的《通志》，有的學者說是紀傳體裁的通史，有的說是典制史的三通之一，有的說是一部類書，近來則有學者說是史學三書之一^④，說法不一而足。然則《通志》仍是《通志》，始終如一。《史通》雖有「史評」、「史論」、「史法」等不同性質的說法，但其實這三種論述並不互相衝突，史評可說是史法的一種表現形式，劉知幾在《史通》的內、外篇章之中透過批評的方式，建立正確的史法；也有學者以為《史通》基本上是屬於「史論」的作品，亦有見地，這個「論」字，可作「討論」、「理論」、「論評」來解，除第三解與前述重覆之外，劉知幾都以之作爲抒發、討論史學理論，尤其編纂方法論的憑藉、場所，當然，其最後目的仍不外乎提供後世史家一個正確的撰史觀念和態度。因

② 章學誠，《方志略例·和州志偶自敘》，收在新編本《文史通義》（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頁398。

③ 呂思勉，《史通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台二版），頁55。

④ 張舜徽氏首用「史學三書」稱述《史通》、《通志》、《文史通義》，在其《史學三書平議·引言》（北京：中華書局，1983）：「往余啓導及門讀史，先之以《史通》《通志·總序》《文史通義》三書，謂必開於前人評史之言，而後能考鏡源流，審辨高下。循序漸進，庶有以窺見治史門徑」。後，拙著，《史學三書新銓》（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即追效前賢，以史學理論爲中心作「三書」的系統比較研究。